

doi: 10.7621/cjarrp.1005-9121.20220717

· 三农问题 ·

不同生计模式下六盘山区易地扶贫搬迁 移民生计资本耦合协调研究*

——以甘肃省古浪县为例

段小红*, 杨岩岩

(甘肃农业大学财经学院, 兰州 730070)

摘要 [目的] 探究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耦合协调有助于全面了解移民的生计问题, 对提高移民可持续生计能力及后续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以甘肃省古浪县易地扶贫搬迁家庭为研究对象, 通过2019—2021年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移民家庭的生计状况进行调查, 选取测度指标并计算各类移民的生计资本值, 根据移民收入来源对生计模式进行分类,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各生计模式下移民5项生计资本间的关系。[结果] (1) 生计资本内部耦合水平总体较低, 处于低度耦合和失调衰退等级; (2) 非农型的生计资本耦合度和协调度最高, 分别为0.299和0.230, 是最为接近中度耦合和过渡协调阶段的生计模式; (3) 两类兼业户的次之, 处在(0.15, 0.3)的区间内, 属于低度耦合和衰退协调的中高级阶段; (4) 纯农户的较低, 为0.172和0.223, 处于低度耦合和协调衰退的中阶段; (5) 补贴户的最低, 耦合度、协调度均在(0, 1)的区间, 处在低度弱耦合和恶性失调等级。[结论] 古浪县不同生计模式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存量和差距, 导致其耦合协调性较差、差异较大。

关键词 易地扶贫搬迁 生计资本 熵权法 耦合协调模型 古浪县

中图分类号: F3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121[2022]07-0164-08

0 引言

2001年我国正式提出易地扶贫搬迁的概念并安排了专项资金, 以搬迁为契机的扶贫行动第一次从国家层面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始实施。20年来, 易地扶贫搬迁始终作为帮助生活在环境恶劣、生计资源匮乏且难以生存的地方贫困人口的重要手段, 2020年末, “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已全面完成, 脱贫人数占总贫困人口的1/10, 搬迁工程成效显著;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 相关工作也进入巩固拓展易地扶贫搬迁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阶段,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 移民区仍存在产业体系发展不完善、生态环境治理进程缓慢、部分居民就业观念落后、社区治理模式落实困难、服务设施闲置等问题^[1-3], 于是“十四五”规划易地扶贫搬迁的重心转移到关乎搬迁群众未来发展、社会融入等后续扶持方面的工作, 旨在提升资源和人类的双向可持续, 助力乡村振兴。

学者王宏新表示国内“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与国外“生态移民”完全相提并论^[4], 国外关于生态移民的研究起始于从迁移的动因来进行概念定义和分类^[5,6], 后逐渐过渡到对安置模式以及与环境关系的分析^[7,8]; 国内学者针对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演进和评价^[9]、搬迁农户意愿^[10]以及可持续生计^[11]等维度, 其中移民生计问题的研究一直占据着易地扶贫搬迁研究的核心位置。国内外学者的可持续生计研究全部基于英国国际发展署建立的可持续生计框架, 国外学者主要对博茨瓦纳自然资源保护区^[12,13]、

收稿日期: 2021-12-20

作者简介: 段小红(1968—), 女, 陕西省华阴人,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农业经济统计。Email: Duanxh@gsau.edu.cn

* 资助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六盘山区易地搬迁农户的生计可持续发展模式变迁与扶贫效应研究”(19XSH021)

菲律宾德尔罗萨里奥庄园^[14]以及伊朗扎格罗斯农村地区^[15]的居民生计问题进行探讨,前期实地调查采用半结构化调查访谈以及焦点小组讨论的方式进行,利用多元统计分析,Logic模型、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分别对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生计轨迹、土地制度改革对农户生计的影响进行研究。国内学者主要面向三峡库区^[16]、“三江源”地区^[17]、喀斯特地区^[18]以及少数民族贫困地区^[19]的生态移民、农民工、失地农民等主体,以生计资本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前期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进行调查,利用专家打分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熵值法等对评价指标进行测算,通过生产要素的分配和收入来源对生计策略进行分类,共同探讨两者动态变迁,并使用多元回归、数据包络分析等模型对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以及匹配度进行研究,从生计风险、风险抵御能力进行生计脆弱性和脱贫减贫效应分析等^[20,21]。国外学者在生计方面的研究范围没有国内学者广泛,却在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具有很多创新点,我国学者应在结合本国国情及具体发展情况的基础上提出符合我国发展的生计理论。如近年来国内学者又将耦合协调机制作为研究生计的创新点,研究生计资本与土地利用行为^[22]、乡村发展水平^[23]、旅游产业^[24]、生态恢复^[25]等其他系统的联系,吴嘉莘、杨红娟和刘倩等学者研究了生计内部的耦合协调^[26,27],认为生计资本之间的存量以及属性差异会影响其内部耦合,生计资本高度耦合协调有助于降低生计的脆弱性和增强减贫效应和脱贫效果。“耦合”源于物理学知识,国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物理学、化学以及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机理分析^[28],且只囿于“耦合机制”并没有结合协调关系。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文章研究区域是国家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古浪县,古浪县生态移民区作为武威市“十二五”依赖实施的一项集易地搬迁、生态保护、脱贫攻坚为一体的综合性工程,截止2020年底累计搬迁了南部山区11个乡镇88个贫困村、1.53万户6.24万贫困人口,布局建设12个移民新村和1个绿洲生态移民小城镇,全县退出了贫困县序列^[29]。在安置好移民居住问题的同时,完善了移民区种养殖大棚、日光温室和灌区蓄水池等产业基础条件,设置生态护林员和其他公益性岗位5000名左右,过渡搬迁移民的就业状态以及扶持“边缘户”与“脱贫监测户”。古浪县易地扶贫搬迁为提升当地高深山区的贫困农户素质、改变生产生活条件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搬迁后农业生产要素的减少、生计资源的短缺、消费支出的扩大等问题影响了搬迁移民生计水平的提升^[30]。因此该文对古浪县移民进行生计模式分类,计算各类移民的生计资本存量,重在研究搬迁移民生计资本内部之间耦合协调状态,判断各生计资本间的影响和发展是否科学、合理,对移民所面临的生计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为当地政府制定相关扶持政策提供参考依据,为移民区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发展提供创新路径;同时也可对移民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既弥补了在生计资本和生计模式方面的研究不足,又深化了可持续生计和耦合协调两大理论之间的结合,增强该研究的理论基础,推动区域生计耦合理论体系的完善。

为了保证研究的真实性和代表性并获取更多有效数据,该文以古浪县黄花滩乡和绿洲小城镇的搬迁家庭为调查对象,于2019年6月至2021年4月调研小组分3次进行入户调查,调研主要采取参与式农村评估法以半结构式访谈等形式对移民进行入户问卷调查,了解基本情况并记录相关数据。对各移民点的搬迁规模、占地面积、地理位置以及基础设施等基本情况进行对比后抽取代表性较强的感恩新村、阳光新村、圆梦新村等9个村和绿洲小城镇作为调查点,采取随机抽样、分层抽样等方法选择调查样本。根据调查点的人数和规模,总共发放调查问卷322份,回收有效问卷310份,感恩新村、阳光新村、圆梦新村和绿洲小城镇有效问卷数分别为47份、53份、50份和41份,其余调查点有效回收问卷均20份,问卷的有效率达到96.27%。问卷内容涉及家庭基本情况、资源禀赋差异和移民意愿调查,对移民的家庭情况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了解。

1.2 研究方法

1.2.1 移民生计模式类型的划分

该文移民类型划分是根据调研地移民生计情况和参考已有研究的划分标准^[31],在以移民家庭农业收入比重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移民的主要生计活动将移民分为纯农型、农主型、非农主型、非农型和补贴型5种类型。

纯农型生计模式是指移民90%~100%的收入依靠种养殖等农业活动;农主型是指移民50%~90%的收入依靠农业经营,同时还兼有临时打工和个体经营等其他生计活动;非农主型是指移民50%~90%收入依靠常年务工、个体经营等非农活动同时兼有季节性种养殖;非农型是指移民90%~100%的收入依靠常年务工、个体经营等非农生计;补贴型是针对60岁以上、孤寡、残疾和无人赡养的“兜底户”所提出来的,生计来源全部依靠政府的各项补贴。

1.2.2 生计资本指标体系、赋值和测算

各学者从研究角度出发提出不同的生计资本指标,参考已有的生计资本量化成果^[32],结合实地调查了解到的研究区情况,该文提出以下特色指标:区别于其他移民地区,政府对研究区移民统一按照人均0.117hm²的耕地进行分配,且与其他移民点“出家门即耕地”的情况相比,绿洲小城镇的居民居住地与耕地的距离长达10km;为了体现以上差异性,该文自然资本指标里添加“耕地距家的距离”指标。国内学者大都将礼金支出规划为金融资本的反向性质指标或影响因素^[33],然而长期在“礼尚往来”的社会法则熏陶下,人们之间互相赠送礼金或礼物成为维系和发展社会网络的重要渠道,周广肃等学者通过对3个城市的居民消费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后,验证礼金支出不属于家庭的正常消费,人情支出多的家庭会拥有较多的社会网络,属于社会性消费^[34];于是在社会资本里添加“礼金支出”指标。

研究区除了兜底户之外剩余的90%移民都是有土安置的农户,所以自然资本的4项指标从耕地出发,耕地的面积、质量、类型、距家的距离都直接或者间接性影响移民农业收入的高低;住房面积、住房结构和生产工具属于移民生活和生产最基本物资储备;移民家庭的年收入和贷款的难易程度两项金融来源对其搬迁后进行再投资产生主要影响,政府及金融机构对移民的资金资助是支撑移民搬迁的动力之一;社会资本是移民进行社会工作、维持人际关系、参加社会组织的交往情况;人力资本包括劳动力比重、文化水平以及专业技能等人力素质相关因素。通过以上对各项资本的说明,利用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5项资本类型来研究搬迁移民生计能力水平,选取了16个生计资本评价指标,构建了古浪县搬迁移民生计资本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1)。

第一步,数据标准化。在选取初始指标时,由于原始数据量纲不一致,在该文中采取最大—最小值法来进行正向指标和反向指标的标准化转换;

第二步,权重确定。依据指标体系的特征、数据间的相互关系,采用熵权法^[35]确定指标权重,其计算公式为:

$$a_j = \frac{g_j}{\sum_{j=1}^m g_j} \quad (1 \leq j \leq m) \quad (1)$$

第三步,依据指标权重和标准化结果,生计资本测算的公式为:

$$v_i = \sum_{j=1}^m a_j x'_{ij} \quad (i = 1, 2, \dots, n) \quad (2)$$

1.2.3 耦合协调度模型

5项生计资本间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可持续生计框架。该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5项生计资本互动过程进行定量分析,有效了解整个生计资本系统的发展水平。生计的耦合协调由生计耦合和生计协调两部分构成,生计耦合反映生计资本指标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程度;生计协调则是在分析生计耦合的前提下,剖析生计资本各要素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程度,又称良性耦合程度^[36,37]。该文从5项生计资本间的存量水平以及差距来考虑生计资本耦合协调程度,更精准地分析各移民点的可持续发展情况。

表1 生计资本指标体系

| 目标层 | 准则层 | 指标层 | 赋值及说明 |
|------|------------|-----------------------|------------------------------|
| 生计资本 | 自然资本 | 耕地面积 | 移民拥有的耕地总面积(hm ²) |
| | | 耕地质量 | 很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非常好=5 |
| | | 耕地类型 | 水浇地=3,旱地=2,沙地=1 |
| | | 耕地距家的距离 | 很远=1,较远=2,一般=3,较近=4,非常近=5 |
| | 物质资本 | 住房面积 | 家庭现有住房面积(m ²) |
| | | 住房结构 | 土木结构=1,砖木结构=2,砖瓦结构=3,砖混结构=4 |
| | | 生产工具 | 拖拉机、播种机、农用三轮车等的数量 |
| | 金融资本 | 家庭年收入 | 家庭年总收入(元) |
| | | 贷款的难易程度 | 容易=1,比较容易=2,一般=3,比较困难=4,困难=5 |
| | | 获得政府资助数额 | 获得政府资助的实际数额(元) |
| 社会资本 | 亲戚在政府任职情况 | 是否有亲戚在政府机关任职(是=1,否=0) | |
| | 礼金支出 | 礼金支出金额(元) | |
| | 参加社会经济组织状况 | 参加社会经济组织的实际次数(次) | |
| 人力资本 | 劳动力数量 | 劳动力占家庭总人数的比重(%) | |
| | 受教育程度 | 受教育年限加总的年数除以家庭总人口数(年) | |
| | 家庭人员接受培训情况 | 0次=1,1次=2,2次=3 | |

耦合度模型公式为:

$$C = \left[\prod_{i=1}^5 P_i / \left(\sum_{i=1}^5 P_i \right)^5 \right]^{\frac{1}{5}} \quad (3)$$

耦合协调度模型公式为:

$$D = \sqrt{C \times T} \quad (4)$$

式(3)(4)中 P_i 为各类型生计资本的量值;

C 为生计资本耦合度; D 为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 T 为家庭生计资本总指数。

显而易见,耦合度 C 和耦合协调度 D 在0~1范围内, C 值和 T 值越大即代表两者极度耦合和优质协调,反之越小两者关联越小、越失调。结合实际情况并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中值分段法划分耦合协调度区间^[38],分别分为以下4个等级(表2)。

2 结果与分析

结合生计耦合协调的测算过程,5项生计资本作为生计耦合协调的主要元素,以各资本的量化结果大小为主,资本间量化结果的差异为辅,分析各类移民资本间的影响程度:资本量越大且资本差异越小,资本间的带动作用越大,耦合协调度越高;资本量越小且资本差异越大,资本间的限制作用越大,耦合协调度越小。通过对以上资本存量和差异的现象描述,找出各类型移民生计耦合协调的主要问题。

由表3可知,在不同生计模式下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发展的系统中,5项资本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总体较低,处在0.150~0.302,属于低度耦合和失调衰退等级,但是协调度的值高于耦合度,表明资本间相互作用较弱,良性耦合的程度较高。与搬迁前居住的南部山区相对比,移民区带给移民更多的生计机遇和更好的生产生活条件,生计资本相对充裕,但是资源禀赋和政府政策的不尽相同,生计资本差异较为明显,资本间的相互推动作用较差,具有较大优化空间。

非农型生计模式的移民资本量最大且耦合协调程度最高,耦合度、协调度分别为0.230、0.299,属于低度耦合和失调衰退的高阶段,生计资本协调状况最好,资本量成为推动资本耦合协调的主要因素;但

表2 耦合协调度区间

| 取值 | 耦合度 | 协调度 |
|-----------|------|------|
| (0~0.3] | 低度耦合 | 失调衰退 |
| (0.3~0.5] | 中度耦合 | 过渡协调 |
| (0.5~0.8] | 高度耦合 | 基本协调 |
| (0.8~1] | 极度耦合 | 高度协调 |

表3 各类型移民生计资本量及耦合协调度

| 生计模式 | 自然资本 | 物质资本 | 金融资本 | 社会资本 | 人力资本 | 生计资本总量 | 耦合度 | 耦合协调度 | 耦合等级 | 协调等级 |
|------|-------|-------|-------|-------|-------|--------|-------|-------|--------|--------|
| 非农型 | 0.037 | 0.051 | 0.097 | 0.081 | 0.116 | 0.391 | 0.230 | 0.299 | 低度耦合—高 | 轻度失调衰退 |
| 非农主型 | 0.039 | 0.047 | 0.098 | 0.083 | 0.091 | 0.358 | 0.205 | 0.271 | 低度耦合—高 | 中度失调衰退 |
| 农主型 | 0.041 | 0.044 | 0.066 | 0.099 | 0.093 | 0.336 | 0.186 | 0.250 | 低度耦合—中 | 中度失调衰退 |
| 纯农型 | 0.053 | 0.043 | 0.062 | 0.065 | 0.058 | 0.291 | 0.172 | 0.223 | 低度耦合—中 | 中度失调衰退 |
| 补贴性 | 0.015 | 0.053 | 0.089 | 0.023 | 0.018 | 0.181 | 0.049 | 0.094 | 低度耦合—弱 | 严重失调衰退 |

非农型资本量的差异也最大,保持在0.019~0.079,是耦合协调滞后的限制性原因。非农型的最高量和最低量资本分别为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根据调研数据,搬迁后古浪移民区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外地企业的招聘,为移民提供了技能教育和就业的双重机会,有接近一半的移民选择非农型生计模式,其中80%的劳动力外流,此类移民投入到当地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严重削减,自然资本带给该模式移民的效益低于搬迁前,自然资本滞后导致整个生计资本值低,农业兼业化现象较为明显。

而两种兼业型生计模式的移民资本差异为中等,在0.006~0.059内,耦合协调度在0.15~0.30,属于低度耦合和衰退协调的中高级阶段。非农主型移民的最高量和最低量资本分别为金融、自然资本,在生计多元化的支撑下,搬迁后的移民人均年收入提高到1.13万左右,较搬迁前增长了30%左右,国家还发放了易地搬迁、农村危旧房改造、生态功能区补偿、扶贫专项等各类补贴,其他政策性银行也向移民区发放财政贴息、基础利率的“惠农贷款”,金融资本最为丰富,但其中部分资本被移民用于解决生活困难(如就医、建房)和进行后续生计发展(如人力素质教育、礼金支出),用来支持当地产业发展的有限,这就导致资本量充裕但对自然资本的作用力弱。农主型移民的最高量和最低量资本分别为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古浪县对搬迁户采取的是插花型安置模式,防止各村落聚集在一起出现社交网分裂,促进各农户农业经验的交流,有助于共同组成或宣传参加专业合作社;然而移民区地处沙漠腹地,土壤沙化比较严重,土层贫瘠,土地用水主要是利用黄灌区的结余水量,在灌溉中存在季节性供水与作物需水不同步的问题,作物生长期的灌水需求得不到保障,土地和水源同时限制了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手段的移民发展,生产所得只够维持自己日常消费,迫使部分劳动力转向非农生计,牵制了向纯农型移民的转变。

纯农型移民的资本量和耦合协调度都较小,仅高于补贴型,耦合度、协调度分别为0.172、0.223,处于低度耦合和协调衰退的中阶段,资本量是限制耦合协调的主要原因,而资本间的差异都较小,这是提高资本耦合协调的唯一突破口。纯农型的最高资本量和最低资本量分别是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搬迁后在移民区产业培育过程中,推行“合作社+农户+基地”的扶贫模式,通过群众以棚入股、合作社经营分红等方式带动贫困群众发展产业。长期以农为主的经营方式使得其土地质量等要比其他移民的优等,但是搬迁前适用于山地的农业生产工具并不适用于搬迁后,比如说畜力的减少,导致物质资本成为农户的限制性因素。

补贴型移民的资本量是五种生计类型里最小,资本差异仅次于非农型,保持在0.036~0.074,以至于补贴型的耦合协调程度最低,耦合度和协调度均低于0.1,处在低度弱耦合和恶性失调等级。补贴型最高量和最低量资本分别为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补贴型是针对绿洲小镇60岁以上、孤寡、残疾和无人赡养的“兜底户”所提出来的,这类移民的生活来源全部依靠政府所提供的等级低保、养老保险、其他紧急救助补贴(医疗、残疾)等补贴,统一安置50~60m²的住房,无偿提供电视机、电冰箱等生活设施,真正实现拎包入住。在政府的扶持下,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获得了一定的提高,但与搬迁前小农的自给自足相比,搬迁后自然资本处于垫底形态,无土安置模式使得部分可以依靠种养殖来补贴家用的移民失去了一项重要的生活来源,基本劳动力闲置现象明显。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1) 不同生计模式下移民的生计资本耦合程度排序为非农型>非农主型>农主型>纯农型>补贴型。原因为:非农作业为主的两类移民资本量积累速度大于其他移民,所以资本耦合度最高;但非农型移民人力资本优势突出,对其他资本带动作用强,所以其协调程度较非农主型的更高。非农型与两类兼业型移民的生计方式、投资组合多元化,应对生计风险能力强,且兼业型移民的资本量和差距处于所有移民的中等程度,故生计耦合协调度仅次于非农型;而非农主型移民金融资本对自然资本带动作用弱,农主型移民自然资本限制社会资本,都成为两类移民资本发展的限制性原因。农业作业为主的两类移民处于中度耦合,兼业型的生计结构较单一型更为合理,生计协调发展能力较强,所以农主型移民的良性耦合程度较纯农型的更高。纯农型和补贴型的移民资本量都太小,资本依赖性太强,没有与其他资本产生正向的影响,限制了其余资本的发展,耦合协调度最低。

(2) 各类型移民的生计可持续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非农型移民对于土地这项自然资本没有合理利用、物尽其用,结合人力资本的外流,优势资本对短板资本起不到帮助性作用;非农主型移民在接受政府和金融机构的专项资金贷款和补贴时对此类金融资本落实不到位;农主型移民在经营农业时生产条件不足,缺乏专业性,与规模化经营的纯农型移民还存在较大差异;龙头企业、合作社等农业帮扶主体对纯农型移民的扶持停留在宏观角度,对农户农业生产工具的缺乏和落后等细枝末节关顾不到位;补贴类移民由于自身人力资本的限制和无土安置的自然资本,缺少更多样的生计方式维持生计。

3.2 建议

根据上述主要问题,面向不同生计模式的移民,提出以下针对性的建议。

(1) 在提升各资本存量的基础上,也要维持优势资本和优化生计短板,缩小资本分异,促进不同生计资本之间的转化,以此促进资本间的影响程度和良性耦合,推动生计资本间的一体化协调。针对非农型移民,在移民区地理位置优越和八步沙林场“六老汉”治沙造林伟大精神的支撑下,移民区可因地制宜发展新型农村产业,推行沙漠露营、骑骆驼、沙滩排球、沙漠卡丁车等项目的“沿沙”旅游和温室采摘、建设游戏体验场、养殖棚喂牛羊等农家体验,提高移民新村的吸引力,减少农村劳动力外流,避免移民村空心化;非农型移民除了对农地进行流转外,农户可将土地作为资本入股,由合作社统一进行藜麦、马铃薯等农产品种植,对闲置土地合理利用,各投资人从中获取分红。

(2) 为两类兼业型移民建立信用档案,深入调查农户种养殖实际需求和困难,“机构+集体+农户”三重主体从资格审查、资金使用、扶助成果方面分3次对“双联产业、农户贷”等专项贷款用途进行监督,积极探索担保机制;扩大调蓄水池的运营范围,增加灌溉频率,对灌溉费用给予补助,全面推广日光温室大棚内的新型滴灌和喷洒设施,实施垄膜沟灌、全膜覆盖等田间节水灌溉工程,实现降低用水损耗与提升土地质量的双赢目标,保障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通过邀请专家、评选优秀养殖大户、开设公众号等线上线下方式普及宣传教育牛羊养殖和藜麦、小黑麦、马铃薯等作物病害识别与防治技术等农业专题,提高农主型移民的专业性经营能力;同时效仿已有的农业专业生产基地,通过设施农业种植樱桃、山楂、火龙果等利润较高的高端水果,承包商可通过张贴海报、宣传大会等方式吸纳当地农户就近务工,在“务工”和“经营”的双策略下促进农民职业化。

(3) 完善土地流转体系,鼓励合作社、企业对撂荒地规整,对农产品的种植进行片区式划分,根据农户的技术专长对农户进行分类,将各类农户分配到对应的土地片区,进行集约化、规模化经营;除了农业合作社对纯农型移民的单面带动外,伴随着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壮大,成立委员会深入基层了解纯农型移民农机需求,审查购置申请,发放农机具补贴和贷款;开展挖掘机、理发、电商等非农就业的培训,争取纯农户投资组合多样化。

(4) 在解决兜底户温饱条件的同时, 在绿洲小城镇周边建设扶贫种羊养殖基地以及扶贫车间此类带有扶贫性质的产业基地, 给有就业意愿兜底户提供家政、手工制作等易操作、对人员专业性要求不高的岗位, 为兜底户多一层收入保障, 将有效改善兜底户生计处于依赖补贴的被动状态, 提高兜底户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 [1] 黄征学, 潘彪.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演进与“后扶贫时代”政策创新. 宏观经济管理, 2021(9): 63-69, 80.
- [2] 司顺文, 杨云婷.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困境及对策研究——以贵州榕江为例. 农家参谋, 2021(18): 19-22, 138.
- [3] 常丹. 防范和化解易地扶贫搬迁后续风险的对策研究.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3(3): 56-61.
- [4] 王宏新. 中国易地扶贫搬迁的演进特征.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7(3): 48-53.
- [5] Hinnawi E. Environmental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Nairobi. Kenya: UNEP, 1985.
- [6] Myers N. Environmental refugees in a globally warmed world estimating the scope of what could well become a prominent international phenomenon. Bioscience, 1993, 43(11): 752-761.
- [7] Carney 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es: Progress and possibilities for change. London: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2.
- [8] Krueger L. Protected areas and human displacement: Improving the interface between policy and practice. Conservation & Society, 2009, 7(1): 21-25.
- [9] 何得桂, 党国英. 西部山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偏差研究——基于陕南的实地调查.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5(6): 119-123.
- [10] 蔡进, 邱继勤, 禹洋春, 等. 秦巴山区不同类型贫困户易地搬迁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重庆418户农户调查.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 42(11): 121-132.
- [11] 刘宗华, 邹兰娅, 刘魏, 等. 易地搬迁移民可持续生计研究——以湖北省宜昌市为例.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41(3): 97-101, 107.
- [12] Twyman C. Natural resource use and livelihoods in Botswana's wildlife management areas. Applied Geography, 2001, 21(1): 45-68.
- [13] Sallu, Susannah, M, et al. Resilient or vulnerable livelihoods? assessing livelihood dynamics and trajectories in rural Botswana. Ecology & Society, 2010, 15(4): 299-305.
- [14] Soltani A, Angelsen A, Eid T, et al. Poverty, sustainability, and household livelihood strategies in Zagros, Iran.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2, 79(7): 60-70.
- [15] Brandon M V, Etienne N, Tony B. Land, landlords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The impact of agrarian reform on a coconut hacienda in the Philippines. Land Use Policy, 2012, 29(1): 154-164.
- [16] 官冬杰, 孙灵丽, 周李磊. 三峡库区生态系统服务与农户生计耦合模型构建及应用. 水土保持研究, 2020, 27(6): 269-277.
- [17] 辛瑞萍, 韩自强, 李文彬. 三江源生态移民家庭的生计状况研究——基于青海玉树的实地调研.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6(1): 119-126.
- [18] 马国璇. 喀斯特山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硕士论文]. 贵阳: 贵州师范大学, 2021.
- [19] 杨梦蓉.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生态移民生计变迁研究[硕士论文]. 贵阳: 贵州财经大学, 2016.
- [20] 李慧, 刘志有, 肖舍松, 等. 基于乡村振兴视角下西部绿洲流转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0, 41(11): 234-242.
- [21] 任威, 熊康宁, 盈斌, 等. 喀斯特地区不同地貌下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因子评估: 以贵州花江、撒拉溪研究区为例. 生态与农村环境报, 2020, 36(4): 442-449.
- [22] 杨林, 汪磊. 搬迁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耦合协调度分析——以贵州省习水县为例. 上海国土资源, 2021, 42(1): 58-62, 83.
- [23] 杨悦, 员学锋, 马超群, 等. 秦巴山区农户生计与乡村发展耦合协调分析: 以陕西省洛南县为例.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2021, 37(4): 448-455.
- [24] 刘智. 旅游产业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的空间格局及驱动机制——以张家界为例. 经济地理, 2020, 40(2): 209-216.
- [25] 梁旺兵, 田红旭. 社会—生态耦合分析视角下民族旅游社区居民生计脆弱性研究.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21, 37(7): 863-870.
- [26] 吴嘉莘, 杨红娟. 中国城乡居民生计资本的时空演变及耦合协调度研究. 经济问题探索, 2020(11): 27-40.
- [27] 刘倩, 张戩, 何艳冰, 等. 秦巴山特困区农户生计资本及生计策略研究——以商洛市为例. 干旱区地理, 2020, 43(1): 237-247.
- [28] 成思敏. 陕北退耕区农业产业—资源系统耦合机制研究[硕士论文]. 北京: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2018.
- [29] 潘晓龙. 提升古浪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发展能力的思考. 甘肃农业, 2020(8): 30-31, 34.
- [30] 朱发斌. 古浪县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变迁研究[硕士论文]. 石河子: 石河子大学, 2019.
- [31] 赵文娟, 杨世龙, 王潇. 基于Logistic回归模型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研究——以云南新平县干热河谷傣族地区为例. 资源科学, 2016, 38(1): 136-143.

- [32] 马国璇,周忠发,朱昌丽,等.改进可持续生计框架下易地扶贫搬迁前后农户生计对比分析——以贵州省贞丰县者相镇安置点为例.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2,43(5):207-217.
- [33] 杜朝运,汪丽瑾.社会互动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征信,2020,38(2):69-76.
- [34] 周广肃,马光荣.人情支出挤出了正常消费吗?——来自中国农户数据的证据.浙江社会科学,2015,223(3):15-26,156.
- [35] 汪磊,汪霞.易地扶贫搬迁前后农户生计资本演化及其对增收的贡献度分析——基于贵州省的调查研究.探索,2016(6):93-98.
- [36] 赵宁宁,郭炎,李志刚,等.中部地区乡村生产要素协同转型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以湖南岳阳为例.自然资源学报,2021,36(12):3170-3185.
- [37] 靳军艳,苏向辉,马瑛,等.农牧户生计与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耦合关系研究——以新疆奇台县为例.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1,42(5):219-227.
- [38] 熊建新,陈端吕,彭保发,等.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地理科学,2014,34(9):1108-1116.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SEARCH AMONG LIVELIHOOD CAPITAL
IN LIUPAN MOUNTAIN REGION'S RELOCATED FARMER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UNDER DIFFERENT LIVELIHOOD PATTERNS *
——A CASE STUDY OF GULANG COUNTY, GANSU PROVINCE**

Duan Xiaohong^{*}, Yang Yanyan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ansu Agriculture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Gansu, China)

Abstract Exploring the livelihood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relocated poverty alleviation migrants will help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livelihood issues of migrant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bility and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migrants. This article took the relocated household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Gulang county, Gansu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livelihood status of migrant families was investigated through on-site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Measurement indicators were selected and the livelihood capital value of various migrants was calculated. The livelihood patterns wer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income sources of the migrants,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5 livelihood capital of the immigrants under each livelihood mode. The results were listed as follows. (1) The level of internal coupling of livelihood capital was generally low, at the level of low coupling and misalignment recession. (2) Non-agricultural type of livelihood capital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were the highest, 0.299 and 0.230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the closest to the moderate coupling and transition coordination stage. (3) The livelihood models of the two types of part-time households was the second, which was in the range of (0.15, 0.3) and belonged to the middle and high-level stage of low coupling and recession coordination. (4) The pure rural households had a lower level of 0.172 and 0.223, which was at the middle stage of low level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5) The subsidy households had the lowest degre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in the range of (0,1), which was in the low-degree weak coupling and malignant imbalance level. It concludes that under the different livelihood patterns in Gulang county, the livelihood capital stock and gap of the relocated poverty alleviation migrants lead to poor coupling coordination and large differences.

Keywords relo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livelihood capital; Entropy method;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mode; Gulang county